

“教化”:一个需要澄清的概念

陈宗章 尉天骄

(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8)

摘要:“教化”概念的建构在时间上是一个过程,在空间上是一个系统。它既是一种方法和手段,又体现了一种境界和理想,表现为合工具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它既关涉德性的养成,又关涉政治的取向,本质上表现为道德性与政治性的统一。总之,“教化”是在个体与社会交往互动的基础上,使一定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和政治要求,有效传递给社会中的个体并内化为自我的内在品质,在普遍性认同的基础上最终通过外在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一项社会实践活动。

关键词:教化 概念 辨析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1)04-0005-04

“教化”是近年来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教化”的完整意义是什么,目前学界并没有说清楚,对于“教化”的理解和使用也是纷繁驳杂。这不仅影响该领域内的学术交流,也不利于“教化”在全社会范围内的顺利实施。在历史场域中探寻“教化”本身的变迁,全面分析其内在意蕴,把握教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从儒家教化思想看“教化”概念的缘起与变迁

教化思想的产生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因此,任何思想的形成,总要受某一思想形成时所凭借的历史条件之影响。历史的特殊性,即成为某一思想的特殊性。^[1]在探讨教化概念的缘起时,要把它放在自身发展的历史语境中考察。《易经·贲卦》有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化成”即是“教化”之意。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教化”,主要出于儒家思想。因此,本文以儒家教化思想为基点,梳理“教化”概念的缘起与变迁。

教化思想萌芽于西周。西周初期,周公面对夏商王朝覆灭的教训,总结出“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诰》)的认识,强调为政者应“明德慎罚”、“敬德保民”、“往敬用治”(《尚书·君》),进而把宗法道德精神渗透进国家治理之中,期望社会各阶层能结合成“道德之团体”^[2]。事实上,这种思想萌芽为早期儒家的教化思想奠定了主调,即把宗法制度和重视血缘亲情扩展到国家治理之中。如陈来所言,

西周文化所造就的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是后来儒家思想得以产生的源泉和基体,它为早期儒家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观、政治哲学和伦理德性的基础^[3]。

教化思想发展于春秋战国。先秦儒家“教化”思想的形成与救治社会现实的弊病、恢复良性社会秩序的主观诉求密切相关。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孔子试图恢复宗法秩序的权威性,积极倡导礼乐教化。他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明确反对“不教而诛”,并提出“先富而后教”的著名论断。同时孔子还要求统治者做到“正其身”,所谓“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其后的孟子和荀子也均是从社会现实出发,以人性论为理论基础,针对社会转型所引发的思想观念的混乱和行为的越轨等无序化社会状态,从而阐发“教化”思想。从孟子的“教以人伦”到荀子的“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荀子·王制》),先秦儒家一方面肯定了西周以来的宗法血缘传统,另一方面又把“仁”的内在精神融入“教化”的内涵之中,把周代的宗法精神上升为自觉的伦理精神,凸显出人伦教化的根本属性。

教化的政治实践肇始于西汉。先秦时期的教化思想已趋于成熟,但主要存在于思想领域,缺乏制度性支撑。秦朝统治者因袭和钦定了法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教化思想,对其进行了制度性设计,但采用的是严刑酷法式的实施路径。时至西汉,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其教化思想也随即转

变为国家的政治决策。统治者坚持“任德教而不任刑”(《汉书·董仲舒传》)的原则,通过设立太学、地方官学、五经博士和乡老等,面向社会广施教化。可以说,传统教化的完整意义是在西汉时期开始实现的,教化的思想也被彻底贯彻到政治实践之中。汉代继承和践履了先秦时期礼乐教化的基本内涵,在理论上又使之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并在政治实践中确立了儒家主流的教化地位,显现出王道教化的历史特征。

教化的实施贯穿整个封建社会。自西汉以来,儒家的教化思想经历了一个从独尊到衰微、调适,进而不断巩固和强化的发展过程。其间,儒家教化思想曾受到佛、道两教的巨大冲击和挑战,但也正是在各家思想的碰撞和融合过程中,儒家的教化思想才得以发展和完善。在经历过宋明理学的重新论证之后,它不仅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化,在政治上进一步加强,而且在实践上进一步融入民间,贯穿于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历程。由于世俗权力对道德的宰制,后期的儒家教化思想越发走向专制化、工具化和神秘化,直至封建制度彻底崩溃,它才退出国家政治实践,但儒家教化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精神依然在社会领域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近现代以来,伴随社会结构的根本转型,传统教化也发生了质的转向,现代性教化随之兴起。尤其是五四运动的开展,全面而彻底地清算了传统教化的观念系统,并在反思与批判中,积极培育出现代性的教化理念,生成了以自由平等、科学民主、个性独立、生命关怀为旨趣的新式教化^[4]。时至今日,教化的概念内涵依然在不断演变与完善之中。

二、“教化”概念的学理阐释

由于“教化”传统的延续及其在社会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学术界一直关注这一问题。尤其是近年来,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对“教化”概念进行了学理上的梳理和概括,从而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教化”的内涵。

第一,强调道德手段与政治目的的统一。葛荃指出,教化是统治者通过学校和其他手段宣扬符合自己意志与利益的一整套价值观,人们将按照统治阶级的要求规范和修养自己,最终成为合乎统治者需要的顺民,从而保证政治秩序的稳定^[5]。张惠芬也认为,教化是运用各种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以及各种社会组织手段,来影响人们的道德意识、思想行为的形成,从而建立起稳固的统治秩序^[6]。在对道德与政治的关系认知上,该类研究者突出强调教化的政治目的性。

第二,强调个体精神和行为的转化。金生蟠认为教化的主旨是以自然的方式、在尊重个人自由的

基础上促使人的精神的成长、发展和自我形成,它包含着精神培育和精神的自我创造相结合的意蕴^[7]。詹世友也把教化理解为人的心灵、精神从自然状态向普遍性状态的可体验的提升,是一个成就人的自由的过程,教化还要塑造形成人生态度,以获得人际的情感沟通、关注人类的健全生存为念,并“培养起清晰、开放和公正的意志”^[8]。由此,教化被设定为提升个体精神、转化个体行为的活动过程,尤其指向内在精神的涵养与圆满,带有浓厚的伦理意味。

第三,强调教化的内部作用机理。杨朝明指出,“教化”本义是上施下效,长善救失,使有改变。“教”指文教,是指使人向善的方向转变;“化”的本义是悄然改变,上有所教,下有所行,便可以称为“化”^[9]。王保国也认为,“教”需明示,“化”需熏陶,“教”是外部灌输,“化”为潜移默化。换言之,“教”主要通过道德教育来完成,“化”主要通过营造道德环境,辅以正确的道德评价为手段来实现^[10]。这种分解式的解读,更能让我们深入教化的内在结构来理解其本意。

纵观学界对于“教化”内涵的理解和界定,大致分为两条路径:一是把它理解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思想意识灌输活动,往往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兼具道德与政治意义。这种理解应该是把握住了教化本质的一个方面,即政治性。但如果过于突出教化过程中道德的手段性和教化的政治目的性,把它仅仅理解为维护政治统治的工具,则容易消解教化的道德内涵,导致政治绑架道德现象的发生。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自下而上式的提升过程,即个体性的提升和普遍性的养成,最终指向一种心灵的释放和精神的涵养。这种理解应该说把握住了个体在教化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突出了人的精神尤其是内在德性的养育,如伽达默尔所以为,教化的一般本质就是使自身成为一个普遍的精神存在^[11]。但这种试图摆脱政治规约的纯粹式教化,又带有强烈的理想性。研究者的相关研究极大丰富了教化的内涵,提升了教化的学术意蕴。但笔者以为,不宜用单线式的思维来理解教化概念,也不宜简单地把道德教化与政治教化混为一谈,从而淹没道德的相对独立性。“教化”应当是两者的结合,一物的两面。在上者施之以“教”,在下者受之以“化”。否则“教化”无从成立。总之,在更高更深入的层面上,理解和把握教化的全部本质,才能更好地界定教化的概念。

三、“教化”与相近概念的科学辨析

研究者出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教化”的内涵,往往出现使用混同的现象。研究中使用频率较高的用词包括教化、道德或伦理教化、政治教化和社会教

化等,有的研究者甚至把教化与教育等作为同义词使用。为此,有必要对它们作进一步的区分和澄清。

1. 教化与教育

“教育”是一个古老的概念,早在孟子就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尽心上》)的说法。但是,教育一词在古代很少使用,它主要是近现代意义上的指称。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解释: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它同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广义上说,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都是教育。狭义的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12]。“教化”和“教育”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内涵了“培养什么人”和“如何培养人”的意思。但是二者不能完全等同,其区别主要在于:①在内容上,“教化”集中反映了中国“伦理为本”、“政教合一”的文化特点,突出了道德和政治两个方面的教育与感化。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即教育者将某种客观知识传授给受教育者,而是集中于人的品质的根本转变。”^[13]而教育的内容包括了思想政治、道德规范、各类知识技能等,为的是促进人自身素质的全面发展。②在方式上,传统社会的“教化”实施除了学校系统,还会通过乡规民约、家规族法、民间的祭祀礼仪、文学艺术等形式,不断融入现实生活,实现自身的具体化、平民化和生活化。而教育的生活化特征并不突出,它更多地表现在教育者通过外在的条件和机制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而且在现实社会中,教育往往指的是学校教育。简而言之,教化的外延大于教育。

2. 教化与社会教化

俞启定等在《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中明确区分了教化和社会教化两个概念,认为教化包括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所有形式在内,是一种“大教育”的概念。社会教化则局限于有目的、有意识的改善社会习俗风尚、并带有教育性质的制度措施范围之内。江净帆认为,在古代汉语体系里,并没有“社会教化”一词,它的完整意义的获得是近现代以后的事,在内涵上主要指面向社会全体,以某种特定的价值传承来实现个体社会化。在内容上主要包括学校教育、乡约、家规、音乐、诗歌、日常读物等,实际上还是传统意义上教化的内容。换言之,社会教化只是强调了人们对传统教化社会属性的理解,其内涵和外延与教化与并无本质区别^[14]。实际上,大部分学者在使用“社会教化”一词时都是作为“教化”的同义词来使用的。笔者以为,社会教化只是在表明教化实施的主体、范围、指向性以及教化活动的社会属性,涵盖了社会对个体的要求以及个体完成社会化过程的多重意蕴,与教化本身并无实质区别。

3. 教化与道德教化、政治教化

在诸多文献中,研究者往往用“道德教化”或“政治教化”替代“教化”一词,这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人们对于“教化”概念的准确理解。“道德”和“政治”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词汇,如果把“教化”等同于道德教化,容易忽视道德的政治性规约,片面强调人的内在精神的提升而陷入理想主义的窠臼。同样,如果把“教化”等同于政治教化,又容易排斥道德的相对独立性,或者只是把道德看作某种手段,甚至把教化简约为一种政治意图。事实上,在传统的文化语境中,道德和政治的关系十分微妙,政治理想总是与道德教化天然地联系在一起,而道德教化是政治社会化的根本途径,它以道德理想作为政治统治目的,以道德规范作为政治行为准则,以道德化作为政治统治手段,以道德规范下的人际关系作为社会政治秩序,以道德力量作为巩固政治统治的精神支柱。由于道德与政治的高度重合,人们接受道德教化也就是在接受政治教育,接受和践行道德规范,也就是在接受政治规范的约束,锤炼道德人格也就是在塑造政治人格^[15]。因此,道德教化具有政治性,政治教化具有道德性,它们共同构筑了教化的内在本质。如果在这种意义上使用“道德教化”或“政治教化”,其内涵与“教化”的内涵是相通的。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纯粹的把“教化”等同于“道德教化”或者“政治教化”则是不严密的,它们二者只是教化实施的两大主体,是“教化”之完整内容的呈现。

四、“教化”内涵的整体认识和新发展

完整界定“教化”的概念内涵对于深化教化理论、推进教化实践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在内容、方法体系和运作模式等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现代社会的教化理论与实践。

首先从3个方面解读传统“教化”的内涵。其一,教化之“教”,指的是“上所施下所效也”(《说文解字》),即把社会所认可的道德、政治规范和价值观念施加给社会中的个体,转变为内在品格。这个过程特别强调“上”的榜样性作用,体现出权威性教化的特征。而教化之“化”,指的是“教”的方式和效果,强调循序渐进和潜移默化,着力于“改过迁善”、“习与性成”,不断渗入到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进而“化民成俗”。正所谓“化,教行也。教行于上,则化成于下。”(《说文解字》)其二,教化是一种方法和手段。一方面,教化是个人修养、提升品质的方法和手段,以礼教、乐教和诗教为主要形式,具体表现为内在的博学慎思、存心养性、反求诸己和外在的择师慎交、化性起伪、注错习俗,等等;另一方面,教化是治理国家、整合社会的方法和手段^[16]。在传统观念里,教化与

国家政治密切相关,如张汝伦所言,政治的目的在于“教”、“养”两个方面;“养”是富民,而“教”是教化。政治或国家的根本目的不仅在于人民的丰衣足食,更在于有优良的品行和行为。因此,教化在任何时候都是政治的理想目标,同时也是为政者的规范性活动^[13]。这样,教化在国家政策的层面上,突出的表现为一种治国手段。其三,教化体现一种境界和理想。一是个人层面的“成人成圣”,培养一种君子人格,指向一种“仁”的境界和善的生活,其本身蕴含着道德启蒙、价值传承和改造人的精神世界的文化与生命意义;二是社会层面的“良性和谐”,协调等级社会秩序,乃至指向崇高的“社会大同”,最终实现个体与社会在根本价值层面上的同一。总体来说,传统“教化”是以人性论为理论基础,以“仁”为核心内容,采用多种教化方法,一方面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一方面引导人们的行为合乎礼义道德规范,从而维护等级社会秩序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对传统“教化”的内涵解读,更多的是从理论层面上展开的。而实际上,由于封建专制体制的封闭性,教化中所蕴含的主体性解释和崇高性理想追求,往往受到专制政治的极大压抑。尤其是封建社会后期,专制体制日益僵化,传统教化的“修身养性”功能也日益萎缩,非但没有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相反成为专制统治、压抑人性的手段和工具,剩下的只有纯粹的外在性规训。近现代以来,社会结构发生根本转型,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从专制社会转变为民主社会,从文化垄断发展到文化多元;“教化”实施的历史条件、自身的内容和形式均发生重大变化。针对于此,我们需要在继承传统教化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现时代的社会实践,以全新的视野来理解教化的内涵。

笔者以为,“教化”指的是在个体与社会交往互动的基础上,使一定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和政治要求,有效传递给社会中的个体并内化为自我的内在品质,在普遍性认同的基础上最终通过外在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一项社会实践活动。其目的,在个人层面上即是心灵的涵养、精神的提升及道德、政治素质的养成,是个体性向普遍性的提升;在社会层面上,是对人之精神世界的整体建构和对国家政治理念的整体认同,从而塑造一个和谐的道德和政治共同体^[17]。可见,“教化”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系统。①“教化”不仅仅是自上而下式的“上施下效”过程,或者自下而上式的提升过程,它应当建立在不同主体间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包含了教化主体对意义的共享和基于理性秩序的自由选择,并在交往互动中实现道德、政治价值观的传递,进而达成某种认同或共识。这一过程是“上下一致、内外结合”的过程,既

有外在的规约,又有内在主体性的发挥。②“教化”表现为工具性与目的性的相互结合。“教化”不仅仅是社会控制和政治统治的手段,还关涉人之精神的提升、人性的自我完善及其在现实社会中的彻底实现,这不仅意味着走出自身,克服个体精神的局限性,还要求从异己的他物出发返回自己本身^[18],进而回归人的本质,最终指向自由的个体以及和谐的共同体。③“教化”的本质表现为道德性与政治性的有机统一,既关涉德性的培育和道德素养的提升,又培养良好的政治心理和态度,实现对国家政治信念和价值观的普遍性认同^[16]。其内容应体现现时代的要求,反应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和政治理念,彰显自由民主、公平公正、关怀生命等现代价值,从而完成从传统教化向现代教化的根本转型。

参考文献:

- [1] 徐复观. 徐复观文集:第一卷[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109.
- [2] 王国维. 观堂集林:卷十[M]. 北京:中华书局,1999:454.
- [3] 陈来. 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 [4] 黄书光. 中国社会教化的传统与变革[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376.
- [5] 葛荃. 权力宰制理性:士人、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社会[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74.
- [6] 张惠芬. 中国古代教化史[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9:3.
- [7] 金生蟠. 规训与教化[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8.
- [8] 詹世友. 道德教化与经济技术时代[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13-14.
- [9] 杨朝明. 刍议儒家的教化文化[J]. 孔子研究,2008(6):8-12.
- [10] 王保国. 教化的政治与政治的教化:传统中原政治文化传播模式探析[J]. 学术论坛,2008(1):49-52.
- [11] 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M]. 洪汉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14.
- [12]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59.
- [13] 张汝伦. 从教化到启蒙: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起源[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73-79.
- [14] 江净帆. “教化”之概念辨析与界定[J]. 社科纵横,2009,24(1):131-134.
- [15] 郭渐强. 儒家道德教化与政治社会化[J]. 船山学刊,1997(1):66-69.
- [16] 陈宗章. 尉天骄. 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转型的“教化论”审视[J]. 学术论坛,2011(2):68-71.
- [17] 陈宗章. 现代性之维与“道德教化”之思[J]. 齐鲁学刊,2011(3):67-71.
- [18] 刘铁芳. 生命与教化:现代性道德教化问题审视[M].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41.